

盡快落實兩地企業聯合「走出去」戰略

陳經緯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國商會主席 經緯集團董事局主席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8月17日在香港出席國家「十二五」規劃與兩地經貿金融合作發展論壇發表演講，其中特別提出要推動內地與香港企業聯合「走出去」。其戰略意義在於：既可轉移內地過剩產能，也可進一步釋放香港服務業的巨大潛能，是兩地企業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必然選擇，有利兩地企業在更廣闊的空間裡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和資源優化配置，更好地從全球獲取技術、市場、戰略資源，拓展兩地企業的發展空間和國際競爭力，令香港與內地優勢互補產生質的飛躍，共同增強兩地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後勁。香港社會應探討如何盡快落實推動內地與香港企業聯合「走出去」的戰略。

李克強副總理8月17日在香港出席國家「十二五」規劃與兩地經貿金融合作發展論壇發表演講，闡述中央政府關於支持香港進一步發展，深化內地與香港經貿金融等方面合作的「六條三十六項」挺港政策，其中特別強調推動內地與香港企業聯合「走出去」，鼓勵內地和香港企業以聯合投資、聯合投標、聯合承接項目等方式，共同開拓國際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可惜，所謂「港大安保風波」一度轉移了視線。現在應該徹底排除干擾，重新探討如何盡快落實推動內地與香港企業聯合「走出去」的戰略。

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對外貿易依存度超過70%的情況下，通過內地與香港企業聯合「走出去」，主動地在更廣闊的空間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向產業鏈高增值環節邁進，提升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是一個極端重要的戰略選擇。只有內地與香港企業聯合「走出去」，中國才更有條件引進更新的技術，發展新的產業，有利於在更廣闊的空間裡進行經濟結構調整。

國有企業「走出去」面臨外部阻力

自2001年「走出去」戰略首次寫入「十五」計劃以來，內地企業「走出去」步伐正在加快。據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今年9月6日聯合發佈的《201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截至2010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淨額達3,172.1億美元，目前內地企業進行投資的地區和國家達178個，僅正式經官方批准動用外匯的已在外設立了超過1.6萬家企業，在海外投資所交的稅金合起來超過100億美元，創造了100多萬個就業崗位。尤其2010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達680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五，在發展中國家排名第一。

但是，內地企業「走出去」，面臨四大挑戰，包括重重外部阻力、支付較高的收購成本、難以獲得優質資產，以及後續整合經營困難較大。外部阻力最重要的是面臨投資所在國的保護主義，並刻意炒作為經濟上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在此情況下，借助香港國際化平台並動用外匯儲備，雙管齊下積極支持有條件的民營企業到海外投資，顯得更為重要。

雙管齊下支持民企到海外投資

首先，「一國兩制」的香港具有各國普遍承認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良好的金融環境、完善的國際化服務體系以及管理經驗和專業團隊，能夠更好地在民企「走出去」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鼓勵民企將海外事務總部設在香港或在港設立對外投資的分支機構，從而提升民企國際化程度；分散部分民企以港企的身份在海外投資，能夠有效規避部分發達國家針對中國內地設置的貿易壁壘，不易受到國際輿論的過度關注和惡意炒作。

其次，中國外匯儲備充足，截至2011年6月末，中國外匯儲備額達3.2萬億美元，位列全球首位。用好這筆巨額外匯儲備是國家高度重視的、涉及全球的大事。利用中國外匯儲備支持有條件的民營企業到海外投資，既切實可行，又一舉多得。一是有助於優化中國外匯資產配置結構，分散風險，提高外匯儲備的安全性和收益率；二是有效解決民企「走出去」投資發展的資金管道，為民企參與國際競爭、創建世界品牌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援；三是將龐大的外匯儲備資產轉換為具有生產力的實質資產，有利於保障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需的戰略資源；四是能夠降低貿易順差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國內投資過熱以及高通脹的壓力；五是在大型企業「走出去」為主導的基礎上，增添一支龐大的生力軍為實施國家「走出去」戰略做出更大的貢獻。

玉宇澄清萬里埃

章剛

自留地
上訴庭裁定港珠澳大橋上訴得直，澄清了對環保工作的法律觀點，撥開了環保工作何所依從的迷霧，釋開了別有用心人士藉環保而妨礙香港發展的枷鎖，鼓舞了港人加快建港興業的信心。因此，這一裁決對香港的環保工作者和事業亮了一絲燭光，雖然還不是掃盡阻礙、清除陰影、前途平坦，但起碼對環保有了較正確的認識，因而初步回到撥亂反正的正確方向。消息傳來，荷鋤觸景的老農不禁輕吟七律一首：

桀犬狂嗥起事端，攻民小丑煽火燃。
婦是愚民猶可訓，妖殘殘斧豈能援。
今日寬懷歌幾遍，明朝欣慰地雙連。
長虹導引登彼岸，繁花茂葉滿陌阡。

上訴庭裁定港珠澳大橋上訴得直，推翻了原判，這是振奮人心的喜訊。但是，香港市民已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損失了65億元、大量建築工人停工、大橋工程進度受阻等等。上訴庭對由公民黨指使朱婆婆興訟的官司作出正確和合乎科學常理的判決：認為環保署已對大橋工程的環保內容做了全面分析，而在工程開始時公民黨「臨門一腳」踢出「基線評估」以求阻礙工程啟動的要求實非硬性規定；同時，裁判並提出應尊重環保人員的專業判斷，不要用個別法官的認知去否定專業人士的全面了解和合情合理的論據。

法律需顧及保育與發展的平衡

法律是社會規則的一種，而環保是環境科學的部分，屬自然科學範疇須服從自然法則。所以，環保工作是否符合自然法則應由熟悉和掌握該自然科學的專業人士審判釐定；正如人類社會中的行為是否違反社會規則，應由熟悉和掌握這些規則（法律）的專家（法官）去審理裁決一樣。現實社會中，法律判決和很多政經活動有着密切關係，經濟學家高斯(Ronald Coase)在《社會成本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中談到，法律應顧及預期發生的後果而求取最有經濟效率的答案。所以，法律對環保事件的案例，除了應尊重環保科學論證之外，也應該考慮到社會民生發展的需求，在保育與發展兩者之間全面地、正確地研究其平衡。同時，法官應該在任何情況下都公正不阿，政治上秉持中立，專業問題上客觀地參考及接納專家論證，這正如死因研究要聽取法醫意見；研究「轉基因」食物是否有有害聽取分子生物學家意見一樣。

公民黨處心積慮狙擊大橋興建

環保並非為某一個人而制定，其工作亦非只為某些人創造一份工。環保的中心任務是為全人類謀長遠的福祉、為地球保持可持續發展、為人類的生存不懈地努力奮鬥。因此，不能在在以保持環境現狀而否定發展，眾所周知港珠澳大橋的價值和對香港的作用，在建造過程和建成之後必然會對環境有所影響，要衡量的就是這些影響有多大，在促進香港可持續發展的天平上傾向何方，可以採用什麼辦法去減少或降低不利的因素，而不是貿然地反對建橋，尤其是在研究可行性時閉口不談，不提積極和有益的意見，而到了開工時才突然發難，這明顯地是有策略的陰謀，其目的是哪怕不能完全制止大橋興建，起碼可以拖延工程使政府（其實是港人）受到巨大損失。

香港重視環保是十分正確的好事，在一個地狹人稠商業高度發展的城市，理應非常重視保持和創造優良的人居環境和自然環境。不幸的是，別有用心的一群人，正正是利用了人們重視環境問題但環保科學和生命科學仍未普及的特定情況下，拿環保之矛以攻發展之盾，煽風點火，屢起事端，挑動市民反對發展工程從而阻延發展。公民黨是這些事端的主要搞手，「大橋」事件亦如是，但是他們卻矢口否認，不過真相逐步證明，港人自應明白。

強化生態教育 免發展被阻

放眼祖國，發展建設如火如荼，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方向，而且不斷深化。舉例來說，2003年胡錦濤主席的「生態文明觀」就是與時俱進的發展演進觀點；他提出「堅持在開發利用自然中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繼而在2005年首次用上「生態文明」這概念。「建立並完善生態建設的法律和政策體系，制定全國生態保護規劃，在全社會大力進行生態文明教育。」明確地指出了發展與保育、重視生態尤其是生態文明教育的必要，也針對性地指出法律和政策在完善生態建設上的重要性。

在「大橋」環保官司過程中，雖然反對派扭曲了事實發表了連篇怪論，但香港市民還是清醒的，所以絕大部分的人都看到了公民黨的政治權術和陰謀。不過，加強生態文明教育仍有必要，因為反對派仍不斷地以環保生態為把柄，揮動其殘缺斧，企圖螳臂擋車，阻礙香港和港人前進。

奧巴馬食言或引爆「失業核彈」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西方走廊

爆發在美國紐約的「佔領華爾街」抗議，影響雖不如「阿拉伯之春」及「倫敦騷亂」般萬馬奔騰、快速猛烈，但「星星之火」卻已向洛杉磯、波士頓、芝加哥、丹佛和西雅圖等其他城市迅速蔓延，其未來發展趨勢自然引起全球的高度關注。「佔領華爾街」顯示民眾對美國貧富不均、經濟不振和失業率高企的強烈不滿，儘管警方逮捕了逾千名示威者，但示威絲毫沒有結束的跡象，抗議者亦已在多個城市中心安營紮寨。參加示威的大學生公開說：「下一步是激勵工人參加抗議活動」。美國現有1400萬失業大軍，如果工人怒火被點燃，無異引爆令世人震驚、蘊藏多年的「失業核彈」。

奧巴馬上任後，曾經信誓旦旦地對失業業者承諾說，很快會創造足夠多的就業崗位；並揚言「要整治華爾街」。他當時對媒體說：「如果繼續對銀行高管、華爾街巨頭採取縱容態度，將引發公眾對金融界的憤怒，後果將會相當嚴重」。白宮為了顯示嚴肅金融的決心，先後向華爾街發出「限薪令」、簽署了長達80多頁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希望華爾街「精英」知難而退。然而，幾年過去，奧巴馬當年的誓言已經成為一縷青煙，不見蹤影；華爾街「精英們」繼續享受他們的日光浴、高爾夫。由於奧巴馬屢屢食言，終於使紐約上演了「佔領華爾街」的「美國之春」。

承諾衍變成「空頭支票」

從美國金融業的歷史上看，代表金融業利益的華爾街與共和黨有更為深厚的淵源。來自芝加哥的奧巴馬擅長的只是「賣嘴乖」，對華爾街的歷史、現狀和運作相當陌生。美國金融瘟疫發生後，奧巴馬向選民保證「必須向年收入25萬美元以上的富人增稅」的承諾，目的既想從金融權客腰裡掏錢，又實現「我能」和「改變」的承諾。隨後推出的「近百年來最大規模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但時至今日，開出的支票不僅無法兌現，華爾街金融巨頭仍然我行我素，其中的貪婪現象也愈演愈烈，明顯的貧富差距和高企不下的失業率，終於引發了震驚世界的「佔領華爾街」

示威行動。

美國金融系統於1930年設計定型，潛藏許多缺陷和毛病，已經完全不適應新時代的需求。1971年尼克松政府曾經提議整頓華爾街，希望加強對銀行、投資業的監督；1984年里根當政時也出過「監管金融機構的相關法規」；克林頓上任後，舊調重彈，呼籲成立強有力的機構，以便「有效控制和防止金融市場震盪」；2008年前財政部長保爾森發表了長達205頁的金融改革方案，誓言對監管體制進行徹底改革；但均無疾而終。奧巴馬關於「全面整治華爾街」的言論則是在不了解歷史、不熟悉運作、不知道深淺的背景下進行的，最後則不了了之，所有承諾都衍變成「空頭支票」。

選民最終將拋棄民主黨

近期的多項民調顯示，美國人對國家現狀、特別是經濟增長疲軟和失業率居高不下深感不滿，超過六成民眾已經表示不認同奧巴馬政府管理國家的做法。據美國媒體披露，有高人最近警告奧巴馬，如果不能在振興經濟、降低失業率上下功夫，儘管僥倖打死了拉登，選民仍然可以用選票拋棄民主黨。失業率已經使奧巴馬的明年選情變得很不妙，調查顯示：55%的美國人認為民主黨明年將退出白宮；85%以上的共和黨支持者則認為，共和黨在2012年絕對能重新執政美國政府。面對民意支持率大跳水，奧巴馬自己也不得不承認，「我能」和「改變」在2012年大選中「身處下風」。

美國民眾已經清楚看到，奧巴馬的辦事風格是「開頭強風暴雨，之後任由自然，最終不了了之」。他上任時極力抨擊布什的經濟政策和伊拉克戰爭，並表示新政府將致力發展美國經濟，通過各種方法增加就業機會，迅速從伊拉克、阿富汗撤軍，但最後幾乎全部「跳票」。他的「遏制華爾街濫發獎金」、「強化上市公司獨立薪酬委員會職能」、「設置專員監管接受政府救助企業的高管薪酬」等套路，很快被華爾街銀行家們識破。於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使奧巴馬的豪言壯語變成烏有。高盛3.25萬名高管在2009年均獲得超過50萬美元薪酬，就是對奧巴馬政策的最好諷刺。

直資學校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正面睇

教育局

日前部分直資學校指教育局加設新限制，不利直資學校發展；教育局認為有需要作出澄清，避免不必要的誤會。

誤解一：有學校指，教育局就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訂立新的計算方法。

一直以來，教育局要求直資學校須按既定的規定提供足夠的獎助學金撥備，以及善用和盡用這撥備以照顧經濟有困難或值得獎助的學生。

有關計算獎助學金撥備的方法是由2001年起採用的既定政策。計算方法是：直資學校須最少撥出學費總收入的10%，作為獎助學金撥備。此外，如學校收取的學費合乎直資單位津貼額的2/3(三分之二)與2-1/3(二又三分之一)之間，則學校在直資單位津貼額的2/3這個水平以上每多收一元學費，便須撥出五角作為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之用。計算方法的用意是容許直資學校可收取較高學費以利發展特色的同時，獎助學金撥備也會同時增加，以照顧清貧學生。換言之，一直以來，收取學費越高的學校，便須撥出更多(超過10%)作為獎助學金之用。

誤解二：有學校指，教育局要求直資學校須把每級的獎助學金撥備，只用於該級學生身上。

直資學校不同級別的收費水平或會不同，即某一級別的學費低於直資單位津貼額的2/3(三分之二)，只須撥出10%，而某些級別的學費則因高於這水平而須撥備超過10%的收入。因此，為準確計算直資學校須提供的獎助學金撥備，我們必須要求學校逐級計算。不過，我們必須澄清，在運用上，教育局從沒有規限某一級別的撥備只可用於該級學生的身上。至於每級學生所佔學費減免/獎學金的數額，及學費減免和獎學金之間各佔的比例，本局重申，學校一直可以根據其實際情況及學生需要，經校董會同意後作校本安排。

事實上，為協助學校善用獎助學金的撥備，教育局更容許學校制定靈活的調配方案，例如用以資助合資格學生購買課本/參考書/文具；贊助合資格學生參加課外活動，包括海外學術參觀活動、交流計劃等。

直資學校的監管

負責檢討及建議改善措施的「直資計劃工作小組」會提出改善措施的建議，並繼續聽取業界及各持份者的意見。工作小組一直強調：教育局監管直資學校的工作，須與直資學校提升本身的管治及內部問責互相配合，相輔相成。因應直資學校享有較大自主權的本質，教育局會避免微觀監控直資學校的運作。教育局的取態，是在監管直資學校和保持直資學校的靈活性兩者之間取得平衡，而採取的策略是協助直資學校加強管治及在校內建立有效的監管機制。直資計劃工作小組的建議將於本年底提交教育局局長考慮。